

## 游走在“独语”和“共语”空间中的新发现 ——论董正宇博士《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

洪 芳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3-0111-02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区域文学研究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 形形色色的区域文学研究或拾遗补缺, 或张扬个性, 或强化问题意识, 或突出地方特点, 不同程度地消解了权利话语形成的“中心”或者“权威”的大一统局面, 进而形成了多元化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巡视以往区域文学的研究, 往往会发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研究角度或理路的调换就能给区域文学的探讨带来新的学术景观, 显示新角度或新理路的独特功能和逻辑威力的新成果的产生, 标志着区域文学研究学术层次的新递升。青年学者董正宇博士《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的现象研究》<sup>[1]</sup> (以下简称《方》) 一书应该属于这个渐次递升过程中的一块重要的碑石。

董正宇博士将具有特殊审美特质的方言作为区域文学研究的突破点, 无疑找寻到了一条便捷之径——更贴近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海德格尔把“因地而异的说话方式称为方言”<sup>[2]</sup><sup>199</sup>, “在方言中各个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 也就是大地。而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 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我们终有意思的人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 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我们的根基和稳靠性”<sup>[2]</sup><sup>200</sup>。大地的语言是生存的语言, 方言是大地上开出的口之花朵, 地域以方言直达人的血脉灵魂之中, 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方言正是以其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力捍卫着文学语言的某种独特性和个体性, 使文学作为特殊的语言艺术具有自在的自体地位。基于此, 《方》“对现代湘籍作家运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具体表现, 使用方言的形式进行比较细致的陈述和分析, 并由此阐释了这些作家与地域的根性联系和地域文化特色”(南京师范大学文法学院朱晓进教授语)。

尤其是在著作上篇(综合论)的第二章(方言情结、楚辞传统与边缘策略)、第三章(话语改造与方言出场)、第四章(方言审美与言语效用)中, 研究主体以深微的艺术感悟力、敏锐的发现逻辑机制、坚实的史料知识结构、缜密的辩证逻

辑思维颇有效地穿越了文学湘军错综复杂、多维交织的文化精神结构, 逐步勘察地域文化对于湘籍作家创作的特色和形成原因具有怎样的推动作用。在著作者看来, 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的动因, 一是“源自根性的母语方言的情结”, 湘人湘地多元生活方式和独特生活图景构成了湖南众多方言之间以及与民族共同语言之间巨大差异的根本缘由所在; 二是“承续久远的方言写作传统”, 在中国文化及文学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中, 现代湘籍作家更是无意识承续先贤“书楚语、做楚声”传统, 试图重新在文学想象中奏响湘楚之音; 三是“自居边缘的文化策略”, 在古代——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文化语境下, 现代湘籍作家做出了自居“边缘”眺望“中心”的身份定位和文化选择。这是通过上述三方面深刻而辩证的透析, 著作者从创作心理、文化传统和文化策略等维度显示出新的理论创新点、新的价值增长点 and 新的思维范式, 达到以前研究者尚未完全达到的整体认识深度和高度。

方言视角的切入为文学湘军们创作的独特性和个体性找寻到了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的根源, 换言之, 为文学湘军们的“独语”行为找寻到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依据, 这是《方》的创新点与增值点, 然而这部著作的学术贡献又并非仅限于此。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 随着外界的冲击和影响, 以及方言自身的局限性和个体性, 随意性极强的方言在潜移默化中似乎渐渐转化为有序的文学形式, 方言的个体性和文学的流通性和审美普泛性之间似乎也在形成一种互为渗透互为牵扯的悖论张力, 这是一种复杂的文学书写现象, 也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崭新课题, 在董正宇博士之前, 国内外的学者似乎还没有对此进行系统详尽的阐释, 《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的现象》应该说拓展了目前学术界关于方言写作研究的疆域, 打开了另一扇曾经被忽略的研究视窗。在《方》中, 著者史无前例地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泛方言写作”, 而这毫无疑问应该是本书一个至关重要的闪光点。所谓“泛方言写作”, 是相对《海上花列传》、《九尾鱼》等纯粹的方言文学作品而提出的

[收稿日期] 2009-03-26

[作者简介] 洪芳(1977-), 女, 满族, 辽宁鞍山人,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系特聘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一个概念,在著者看来,之所以要提出迥异于“方言写作”的“泛方言写作”概念,是因为唯如此才能更好涵盖一种文学事实——即从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文学事实观察,虽然不同时代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有方言文学倡导的零星声音,但纯粹意义上的方言作品少之又少,不成阵势。纵观全文,“泛方言写作”概念的提出,的确使著者找到了准确介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它使得著者在关注现代湘籍作家“独语”状态的同时也能够兼顾时代“共语”对于“独语”的纠葛和牵绊,它使得著者对于方言写作的研究能够在“独语”和“共语”艺术空间里自由穿梭,从而使得学术研究得到一种更为全面的舒展和充盈。

在“独语”和“共语”的艺术空间中自由穿梭的董正宇博士,以独特的艺术感觉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耳目一新的发现,这种发现集中体现在著作的下篇——现代湘籍作家的个案分析中。著作的下篇是尤显著者功力的部分,在这部分中著者以“泛方言写作”的视角切入,对于沈从文、周立波、韩少功、彭家煌、古华、何顿等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湘籍作家作品进行了详尽系统的阐释和剖析,时有真知灼见闪现。例如著者认为“《边城》的写作,意味着沈从文文学‘湘西世界’整体框架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沈从文语言形象的确立和自由境界的抵达”,这种从容写作境界抵达的成功如果从语言资源方面观察,主要在于三方面的完美整合,即“湘西‘母语’——《边城》的语言底色”,“‘古典’话语——深层诗意的传达”,“欧式语言——被改造的语言形式”。这样著者从语言学的视角系统阐释了如何通过文本中的独特语言形象,沈从文传达出别样的生活图景——即心灵对生存世界的独有的文学想象,从而对现代汉语文学以及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再如《主流话语缝隙中民间话语的再现——周立波》一章也是《方》中写作非常成功的部分,正如著者所言,对于周

立波评论家们历来存在一个有意味的“两极阅读”现象,围绕周立波及其创作既有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也有不少否定的声音,著者力图所做的就是返回历史现场,从“泛方言写作”的独特视角出发对于周立波及其创作进行一次客观、公正的评价。在著者看来,只有结合时代的具体文化语境重新审视文本的文学语言策略,也许才能找到一条正确认识或者破解曾经被树立为“经典”文本的道路。在《主流话语缝隙中民间话语的再现——周立波》一章中著者撷取周立波的两部代表作品——《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进行颇有深度的挖掘和阐释,从对于文本中关于方言资源运用的考察,勾勒出周立波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所走过的艰难的语言还乡之路,其中“对周立波从东北方言到湘中方言的转变尤见深度。结合文本,寻根溯源,贯穿了大量的文学现象,富有系统性和学理性”(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功正语)。同样在论及韩少功、彭家煌、古华、何顿等其他现代湘籍作家作品时,著者也提出了大量的颇有见地的看法,尤其难得可贵的是,关于这些作家作品的分析著者并没有将其处理为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使其在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时代意义上的连贯,或者说使其能够前后呼应体现出现代湘籍作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内在逻辑,因此从此意义而言,《方》的下篇既可以看做是关于现代湘籍作家的个案分析篇,也可以看做是关于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的发展简史篇。

#### [参考文献]

- [1] 董正宇. 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的现象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2]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